

乡村教育振兴的实践逻辑——基于小凉山彝族村的叙事研究

王代芬

玉溪师范学院，云南玉溪，653100；

摘要：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兴则乡村兴，教育强则乡村强，为促进乡村教育振兴，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叙事研究的方式再现普山学校教育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人物与事件，研究发现小凉山的乡村教育振兴的实践逻辑是一个“人立他助”的渐进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坚持、努力与奋斗以及外部力量的支持和保障。通过研究试图为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微薄参考。

关键词：小凉山；直过民族；乡村教育振兴；叙事研究

DOI:10.69979/3029-2735.25.4.06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结底靠人才、靠教育”。^{[1]:序1}然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7}，需要通过“教育兴农，复兴国家”^{[1]:序1}，于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先后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指出乡村振兴要优先发展乡村教育事业。优质的农村教育，有助于促进社会合理分层和有序流动^[3]，更有助于中国梦的实现。

1 问题的提出：小凉山乡村教育振兴何能尔

乡村教育是“在乡村办的教育，不仅包括学校教育，还包括社会教育、民众教育”^{[1]:3}，本研究指向学校教育，即“在乡村地区学校开展的义务教育阶段有目的、有组织地影响其身心发展为教育目标的教学实践活动”^{[1]:4}。普山彝族村位于云南省宁南彝族自治县（后简称宁南或小凉山，直接引用除外），其东南部山区与四川大凉山相连，故又称之为“云南小凉山”^{[5]:1}。“宁南社会发展背景特殊，是从原始共耕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一步跨千年”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县份”^[6]。解放初期，宁南是一个全国闻名的集“山、少、偏、穷、特”为一体的深度贫困县”^[6]，亟待发展，但路在何方？“2020年11月13日云南省政府批准宁南县退出贫困县，全县18826户82464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困扰宁南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得到解决”^[6]。区区60多年的时间，就取得了这样的历史发展奇迹，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变化与腾飞？在他们看来，唯教育尔。但宁南县的教育事业及其落后，只有少数巫

师熟悉文字^{[5]:96}。甚至到了19世纪40年代，“全县只有10来所小学校，学生仅限于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富家子弟。识文断字者不到总人口的4%……找不到一个劳动者出身的识字人”^{[7]:1}。那么“一个现代教育起步于1956年的国家级贫困县，地处偏远高寒山区，交通闭塞，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口素质低下，祖祖辈辈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温饱苦苦奋斗多年，仍走不出贫困轮回的阴影”^{[8]:序1}的小凉山是如何探索并确定了教育这条走向文明富裕的道路，又是如何发展和兴盛的？文章试图通过研究普山学校教育发展，进而窥见整个小凉山的乡村教育振兴的实践逻辑，为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微薄参考。

2 叙事：普山办学历程

普山学校70余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人物是鲜活，相互之间的交织形成了一个个的精彩的故事，只有通过叙事才能将这些故事绘声绘色地叙述出来。而只有在个案叙事的基础上才能在分析时超越了个案本身，将其与时代背景、社会变迁、族群与地域文化相联系。普山彝族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村里全部为彝族，解放前全村仅有9户人家，分别归属依火（汉姓李）、加三（汉姓杨）两个家族，办学之路之路并不顺利，基本可归纳为四个时期。

2.1 萌芽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普山没有学校，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1961年，普山出了第一批接受教育的学生，年仅5岁的李*华和9岁的杨*国，他们到另外一个村的一个老爷爷（仅有小学文凭）家里学习，每天早上起来

走很远的路去上学。其不是私塾性质的，而是邻近几个村落就这么一个“文化人”，为了更好地与外面的“世界”建立联系，所以几个村商议给这个老人一点公分（公社运动时期），让其负责教育几个村愿意去学习的孩子，由公社出资，学习仅局限于简单的语、数知识。教学属于“半工半学”性质，早上学习文化知识，下午上山砍柴交给公社抵扣公分。他们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完成小学教育，考上并接受了正规的中学教育，但没能继续上高中，“地主”家庭出身的二人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逆境催人早熟，年纪尚小他们却已经深谙世界之大，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走出大山，摆脱贫穷的命运，故时常鼓励比自己小的孩子和下一辈继续学习，要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虽彼时的普山没有校舍，没有师资，没有书本等学习资料，经济条件落后，且还是批斗的重点对象，但他们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在忙碌之余，自愿无条件带领村里愿意学习的人进行学习，在家里或野外，以树枝、木棍等为笔，以泥土、沙子为黑板，学习简单的语、数知识。

2.2 初建时期

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扫盲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普山的青壮年文盲，学得好的人能在大队上（公社）获得一定的职位，这也让更多人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主动让孩子跟着二人学习。1974 年，学过驾驶技术的李*华成为了政府的专职司机，他将工资给“学生们”买了学习资料、笔、本，还去完小借教材来抄，每次回来都会检查学习情况，想尽办法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村子里也把一个废弃的房子给“学生们”作为学习的场所，房子十分破旧，遮风挡雨尚且困难。但就是在这样恶劣、艰苦的环境中，这个特殊的学校“办”起来了，其还诞生了后来普山小学重要的两位教师。

2.3 发展时期

1977 年，普山的孩子终于能够“正常”上学了。而由于有了前期的学习积淀，有几个孩子直接进入完小三年级接受正规教育。1978 年，李*华经村民推荐成为了村（行政村）支书，杨*国成为了普山自然村村长，这使得他们“教育为重”的理念进一步得以践行。1979 年《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出台，普山部分成分问题较大的孩子也获得

了入学机会，所以当时学校里学生的年龄在 5-14 岁间。李*华在普山村民会议上动员大家协调出一间条件相对较好的房子作为学校，取名普山小学，招收 1-3 年级学生，但师资十分棘手，只能进行“复式教学”，甚至一个老师（多半是小学毕业或者初中辍学回家的“小老师”）承担了全科教学任务，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师一校”。完小的师资也十分有限，仅限于偶尔来支教，或者让普山的老师抽空到完小学习。这个状况持续到 1984 年有个改善，第一批读出去的两个肄业高中生成为了普山小学固定的代课老师。学校、师资的问题解决了，但学杂费也是一个难题。有孩子在求学的家庭，在村子里的小学前三年相对还好一些，但三年级和初高中之后，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村里没有支撑产业，靠天吃饭的年代养家糊口都困难，更别提上学了，女孩子就更不用想了。面对这样的问题，李*华和杨*国一是定期组织村集体大会，大家在一起谈论各家孩子。由此，“比孩子”成了村里的一大“流行趋势”，孩子书读得好的家人走出去都倍有面子。高中肄业的两位老师更是村里孩子膜拜的对象，也是长辈教育孩子的标杆。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家庭内部也开始“攀比”起来，如李*华家里成绩较好的孩子通常是有优待，比如可以做较轻松或者较少的农活，或逢年过节可以获得一件新衣或一双新鞋等。二是每个学期大学或高中开学前，每个家族都会召开家族会议，大家有钱出钱（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有力出力（孩子外出读书了，家里缺乏劳动力的就帮忙干些活计）。三是带着点强制性的筹钱活动，有供养大学、高中或供养多子女读书的家庭，可将家里饲养的猪或者其他牲畜杀了卖个村里面的人，每家根据人口和经济情况必须一定额度。这样的举措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或者怨言，许是村里就两个有姻亲关系且比较团结家族，许是组织者的威望让大家信服，也或许是彝家人独有的淳朴义气，大家都愿意出一份力。所以那个时候出一个高中/大学生基本上是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举力而为的结果，但不管如何，普山的教育发展起来了，虽然磕磕绊绊，但未来似乎一片光明。虽然女孩子上学的数量依然偏少，但至也有了零的突破。

2.4 成熟时期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宁蒗的教育在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迈上了新台阶，普山的学校教育也随之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两名代课教师由于教育业绩成绩突出，

获得了多次教师进修和学历提升机会，且在履职考核中连续几年获得优秀教师称号，转为了正式编制教师。这在村里又成了一件轰动的大事，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教育让身边的人端上了“铁饭碗”，吃上了“公家粮”，这让他们更加坚定“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且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普山小学开始修建新校舍，配齐了基本科目的师资，不用三个年级的孩子挤在一起进行复式教学，每个年级都有了独立的教室，还有了操场和一些户外体育设施，教学设备与资源逐渐齐备起来。1998年普山通电了，这让学校的教室更加明亮，普山孩子心中的光也更加明亮。2000年之后，村里培养出来了第一批大学生，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初高中肄业的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出路。尤其是李*华家的两个女儿通过教育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并扶持弟弟妹妹上学，这使得普山村民发现女孩子并非“生来向外”，也可以撑起一片天，从此更多的女孩子拥有了入学的机会。周边村落看到普山的成功，也开始纷纷效仿起来。同时，普山老旧的房子也在不断推翻重建，孩子的学杂费已经不是太难的问题，只要孩子愿意学，家长就有能力供养，整个普山充满了欢声笑语，一片欣欣向荣。2010年普山小学进行了撤点并校，归到了政村完小。截止到2010年，普山学校教育中有30人通过接受教育走出了大山，其中本科28人，研究生2人（硕博士各1人）。2015年县级教育大会在行政村完小开设，普山的教育经验被屡屡提及，尤其是李*华坚持让女子接受教育的行为受到了嘉奖。虽然普山小学已经不存在，但其成为了教育成功的“范例村”。虽然进行了并校，学校距离普山有一定距离，但是普山人愿意克服种种困难让孩子接受教育，“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根植与他们的心中，普山的精神还在延续。

3 人立他助：小凉山乡村教育振兴的实践逻辑

综上，在普山办学的整个过程中有两股主要的力量：一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普山教育振兴的内在动力；二是他助，即普山外部力量的支持，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普山教育的发展。而整个小凉山教育的实践逻辑亦如是，尽管当时的宁蒗尚有16万余人尚未解决温饱，但他们甘愿放弃眼前的物质需求，用暂时的牺牲和赤诚的付出去奠定民族教育坚实的基石，这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需要的是大山一样的磅礴胆识，这就是小凉山精神^{[8]:306}。

3.1 转变观念，致力教育优先

一是上行下效，干群一体。在认识到贫穷的根源在于人才缺乏、人的素质低，要脱贫必须先提高劳动者素质，优先发展教育之后，宁蒗故制定了“积极办好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狠抓成人教育”和“治穷先治愚，经济开发与智力开发相结合”的方针，还开展专题研究教育工作^{[8]:234}，逐步改变干部和群众的陈旧观念，从“国家的学校”变成了“自己的学校”，从“要我读书”变成了“我要读书”^{[8]:253}，从“要我办学”向“我要办学”转变。^{[7]:189-19} 二是宣讲政策，依法治教。从1985年起，每年8月都开展教育宣传月活动，尤其是女童入学问题。甚至把义务教育有关的内容写进乡、村规民约，使教育优先，依法办教育的思想深入人心。同时制定并严格执行“三包三保”^{[8]:235}的制度。三是国家支持，外部保障。宁蒗是国务院确定扶持的特困县^{[8]:233}，因此国家、政府教育方面也出台了诸多政策倾斜以扶持。如加大财政对地方教育资金投入；对教师发放边远贫困地区津贴；对学生降低录取分数线、奖助学金帮扶、提供勤工助学岗位等。这些政策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村民接受教育的热情。

3.2 尊师重培，建设教师队伍

经济发展靠科技，科技进步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质量靠教师。^{[8]:234} 随着教育战略地位的确立，教师经济待遇的改善，教师的社会地位、政治待遇也有了很大地提高，尊师重教在宁蒗逐渐形成风气。一是尊师如舅，提教师地位。把最高礼节献给教师，称人民教师为到舅^{[7]:182}，开展教师座谈会，教育宣传月也大力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各级领导对教师也是尊敬且关怀备至，实实在在为教师办实事，帮助解决教师的诉求与难题。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有了质的提升，党对愿意进步的知识分子敞开大门，积极关心培养，吸收他们入党^{[7]:182}。二是提薪加资，提教师热情。教师的薪资待遇无疑会影响到教师对工作的积极性。宁蒗表示“从来不差教育钱，从没拖欠过教师工资”^{[7]:184}。此外，为引进和留住教师，宁蒗曾以工资浮动两级、家属农转非等优厚条件招聘教师^{[8]:292}，对海安支援教师和家属也给予了诸多优惠政策^{[7]:257}。除工资外，宁蒗县委、政府设置教育重奖，用来奖励优秀教职工、远山区教学教师，甚至可转为公办教师。三是提质增效，重评强教。“没有好教师，教不出好学生”，所以宁蒗狠抓教师素质的提升。首先引进优秀师资。群体引进沿海发达地区的教

学管理人员，创办宁海中学^{[8]:306}，努力“办好民族中学，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培养人才”^{[7]:177}，增设初中女子部，打破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少数民族教师逐年增加。其次是提升本地教师素质。通过开设师资培训班、进修学校、择优推荐或是自学考试到高校（或函授）提升学历，还“组织教师参加外地的讲习会、研讨会”^{[7]:178}。如此教师文化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也得到了质的飞跃。最后是规范考核评价。对教师进行相对科学化、制度化的考核，且考核指标完成度逐渐与津贴、奖金的发放和评优晋级挂钩，逐步走上“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全面考核的轨道。通过培训考核，有效提升了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激发教师献身教育事业的热情，更好提升教育质量。

3.3 筹措经费，支持教育发展

宁蒗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明确职责，“把入学率、巩固率和办学条件列入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县政府明确提出用“三个一点”^{[8]:303}筹措经费，掀起了集资办学的热潮。一是财政拨款，彰显国家力量。90年代后宁蒗县教育经费，每年都在占全县财政指出30%左右浮动，表示：“再困难也要挤出钱来保证改善办学条件、师资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教育奖励基金这四块。”^{[7]:184}二是内部集资，汇聚民众力量。坚持“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走上级资助与众支持办学的路。通过集资办学，改善了部分办学条件。且在“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念的指导下，开展了“勤工俭学”^{[7]:191-192}，这不仅减轻了家长经济负担，改善了办学条件，也对学生劳动观点的培养和劳动技能的训练起了很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勤工俭学让大部分学生圆了“读书梦”。三是外部筹措，借助社会力量。因办学成绩显著，宁蒗赢得了世行贷款、希望工程捐资、公司企业、妇联等社会力量的支持，这些资金促使宁蒗办学条件有明显改善，投资效益明显提高^{[7]:193}。

3.4 变革创新，提升教育质量

一是因地制宜，实行特殊措施。首先划出特困村，实行教育优惠政策。如学生免学杂费和课本费提供、有寄宿生活补助、女子中高考加分等，教师有生活费补助。其次是重点和一般结合，分层次举办各类学校。设立职业、中小学、幼儿园重点学校，面向全县择优招生，师

资和设备重点配备，为优秀孩子创造一个相对优越的学习环境。最后是群体引进沿海发达地区的教学管理人员和教学方法办学。学校开办以来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8]:306}。二是因生施策，开展教学变革。宁蒗积极进行教育教学变革，根据山区孩子的特点，探索适宜的教育教学方法。如提出了社会、家庭、学校“三结合”设想，积极改善社会大气候，学校家庭小气候，优化教育环境^{[8]:30}；出台了“优生带差生，领导帮差生，备课备差生，辅导点差生，上课抓差生”^{[8]:310}的措施；推出了“两功一法”“三风建设”等举措。三是因校改制，重视教育管理。重大改革举措是教育试行分级管理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三制”改革^{[8]:272}，为深入推行“三制”改革，还采取设立教育奖励基金、教育重奖等配套措施。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从而拉开了教育管理从无序化走向有序化的序幕，教育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3.5 无私奉献，倾注教育情怀

宁蒗县有一支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有一批懂教育、会管理的干部，他们爱岗敬业，以红烛和春蚕的精神，默默地在小凉山上、金沙江边、泸沽湖畔奉献着智慧和爱心。他们也许没有显赫的功名，但他们是小凉山文明丰碑上不可或缺的基石^{[8]:序2}。一是敢说能干的领导。他们有的践行“教育为立国之本”，艰难办学^{[7]:226}；有的“志在凉山脱愚昧，誓谱教育新篇章”^{[8]:19}，大胆任用教师；有的不断改革创新，促教育稳步提升；有的带头示范，尊师重教。二是吃苦耐劳的教师。他们扎根边疆，奋力躬耕^{[8]:46-51}，重视德育教育^{[8]:40-41}，探索出适合于少数民族学生的“一讲二练三写四结合”的“四步语文教学法”^{[8]:37}，关注女童教育、摸索出“以童话故事开展英语教学活动，以课本内容为中心开展语法分析讨论，以大纲为中心设计练习题，以综合复习训练完善对课本知识的把握”的教学法^{[8]:64-68}，制定了“两联一办、家访和献‘四心’工作制度”^{[8]:52-56}，实施“五个必谈”^{[8]:57-63}。他们为宁蒗民族教育事业捧出一颗赤诚之心，是小凉山民族教育视野的拓荒者，是他们无私奉献为宁蒗教育的腾飞不断丰满羽翼。三是淳朴无私的乡民。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激起了广大乡村干部群众集资办学的积极性，出现了很多动人事迹。有身背3万元集资款到县上请求列项改造行政村完小村舍的集资者代表，有自筹资金盖教学楼，有主动捐资建球场。捐

资、投工献料,群众宁愿自己苦一点也要集资办教育^{[7]:190}。

4 结语

“人力他助”是小凉山乡村教育振兴的实践逻辑,如果离开了国家和兄弟地区的扶持和帮助,要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是很困难的,但更重要的自力更生这个长期因素,在吸收和借鉴先进地区的教育管理经验基础上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经过70余年的努力奋斗,宁蒗教育事业日新月异,成绩卓著,创造了小凉山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重教兴教依法治教、尊师重教已蔚然成风^{[8]:序2}。“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小凉山的乡村教育振兴已然在握,而未来继续在教育振兴乡村的路上探索。

参考文献

- [1] 魏风云. 乡村教育振兴研究[M]. 人民出版社, 2020.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3] 王代芬. 哈尼族地区师资结构失衡与突破——以M县D小学为例[J]. 红河学院学报, 2022, 20(01): 14-20.
- [4] (法) 卢梭著, 李平沤译. 爱弥儿[M].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43.
- [5] 《宁蒗彝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 宁蒗彝族自治县概况[M].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5.
- [6] 宁蒗县简介[EB/OL]. 宁蒗县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http://www.ynnl.gov.cn/xljn1x/c101288/202109/b43cc3fabff74adb9ad5bf907a18d9a1.shtml>.
- [7] 宁蒗彝族自治县教育局. 宁蒗彝族自治县教育志[M].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7.
- [8] 徐天永. 教育——小凉山腾飞的翅膀[M]. 云南美术出版社, 1997.
- [09] Peacock, CJ, L. The Anthropological Lens: H arsh Lights, Soft Focu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4-26.
- [10]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 赵旭东等译. 社会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820-821.
- [11] 巴战龙. 教育民族志:含义、特点、类型[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8(03): 10-13.
- [12] 奥布著, 石中英等译. 教育人类学[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17.
- [13] 刘玉玲. 教育人类学 [M]. 台北: 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3.
- [14] 蒋立松, 程紫嫣. 教育民族志的本土实践及其意义:以西南地区为例[J]. 民族教育研究, 2021, 32(02): 123-130.
- [15] 宁蒗彝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研究室编. 宁蒗大事记[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6: 83.
- [16] 李强. 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J]. 社会学研究, 1997(04): 34-43.
- [17] 郑筱婷, 孙志颖, 陆小慧. 为何“读书无用论”重返农村?——不同出身个体教育回报率变化的解释[J]. 劳动经济研究, 2019, 7(05): 53-77.
- [18]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小凉山“直过民族”教育兴村的实践逻辑——基于云南宁蒗普山彝族村的个案研究》(2023J0968)成果。

作者简介:王代芬(1990-),女,苗族,云南文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